

疫情的经济影响：一种奥地利学派的分析
ECONOMIC EFFECTS OF PANDEMICS: An Austrian Analysis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 文
熊越 译

（草稿写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 月 27 日之间）

【内容摘要】在当前疫情席卷全球背景下，本文提供了一种奥地利学派视角的，对当前疫情的主要经济影响的分析。首先，我们研究了疫情对经济结构的可能影响。其次，我们考虑了由企业家精神的动态效率驱动的自发市场秩序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以去中心化的方式专注于发现疫情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相比之下，我们将分析用国家的系统性的、强制性的权力来施加上级决策时，经济计算和资源有效配置的不可能性。最后，我们讨论了政府（尤其是中央银行）在货币和金融市场中进行大规模干预，以寻求通过减轻其影响来应对这种疫情的具体案例。

【关键词】疫情 生产结构 社会协调 企业家精神 货币政策

【作者】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社会与法律科学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教授

引言：反复出现的繁荣与衰退周期，还是由异常现象引起的孤立危机

传统上，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家们特别关注影响经济的反复出现的繁荣与衰退周期，以及对这些周期与资本财货阶段结构的某些特征性改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毫无疑问，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是奥地利学派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分析贡献之一。其成员设法解释了信贷扩张过程如何导致系统性的投资错误，从而导致不可持续的生产结构。此类过程由中央银行推进和协调，由私人银行部门实施——私人银行部门以部分准备金运营，以存款的形式从无到有地创造货币，然后在没有事先实际增加自愿储蓄的情况下，通过向公司和经济主体的贷款将其注入系统。生产结构被人为地转向大量资本密集型项目，这些项目只有在更遥远的将来才能到期。不幸的是，各经济主体将无法完成这些项目，因为它们不愿意通过牺牲足够的即期消费（换句话说，通过储蓄）来支持这些项目。某些回归过程会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揭示出所犯的投资错误，并需要承认这些错误，放弃不可持续的项目，以及通过将生产要素（资本财货和劳动力）大规模地从被错误使用的地方转移到新的、不那么雄心勃勃但真正有利可图的项目中来重组经济。反复出现的周期既可以通过部分准备金银行以信贷扩张的形式来作为主要货币提供者在本质上的不稳定特性来解释，也可以通过理论家、政治当局、经济和社会主体，尤其是中央银行家——他们将经济繁荣视为一个要在短期内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的目标，并将注入货币和信贷视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放弃的工具——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偏见来解释。因此，一旦复苏顺利进行，当局迟早会屈服于旧的诱惑，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政策合理化，并重新开始扩张、危机和衰退的整个过程，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必要的改革措施，以终止反复出现的周期（基本上是废除中央银行、货币的重新私有化——古典纯金本位——以及使私人银行服从私有财产法的一般原则，即对活期存款和等价物要求 100 % 的准备金）。然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始终规定，如果比如战争、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自然灾害或疫情导致不确定性大幅度增加，对货币需求的突然变化，可能还有社会时间偏好率的突然变化，那么这些改革将不会避免孤

立的、非重复性的经济危机。在这些情况下，资本财货阶段的生产结构甚至可能被永久性地改变。

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像当前这样的疫情（类似的疫情在人类历史上已发生多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触发这些和其他经济影响，以及国家采取强制干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减轻疫情的负面影响（或者相反，可能会适得其反，加剧这些影响，并使它们持续更长的时间）。首先，我们将研究疫情对经济结构的可能影响。其次，我们将考虑由自由的和创造性的企业家精神的动态效率驱动的自发市场秩序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以去中心化的方式专注于发现疫情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相比之下，我们将分析用政治努力来施加上级决策（即以中心化的方式利用国家的系统性的、强制性的权力）时，经济计算和资源有效配置的不可能性。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中，我们将研究政府（尤其是中央银行）在货币和金融市场中进行大规模干预，以寻求通过减轻其影响来应对这种疫情的具体案例。我们还将重点关注同时实施的涉及税收和公共支出增加的政府政策，这些政策被描述为灵丹妙药和普遍疗法，可以解决困扰我们的不幸。

疫情对实际生产结构的影响：劳动力市场、资本财货阶段的过程与不确定性的影响

（一）劳动力市场

一种新型、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它遍及世界各地，并具有很高的死亡率——的出现，无疑构成了一种灾难性的情况，能够在短期、中期甚至长期内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这些后果中包括人的生命的代价，其中许多生命仍在积极地进行生产和创造。例如，让我们回顾一下，所谓的“西班牙流感”自1918年以来在全世界造成约4000万至5000万人死亡（超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包括战斗人员和平民在内的死亡人数的三倍）。这种流感疫情主要袭击了相对年轻和强壮的男女；也即是处于主要工作年龄的人。^①相反，当前由SARS-CoV-2病毒引起的Covid-19疫情在85%的受感染者中仅产生了相对较轻的症状，尽管它对其余15%造成了重创。对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来说，它需要住院治疗，并导致病情严重的住院患者中接近五分之一的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年龄较大的退休人员和此前已患有严重疾病的人。

因此，由于工作年龄人群死亡人数的增加相对较小，当前的疫情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和人才供应没有显著影响。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这种情况与“西班牙流感”所产生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西班牙流感”之后，据估计全世界的劳动力总供应量下降了2%以上。这个数字既考虑了该疾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考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该疾病造成了4000万或5000万人的伤亡，而战争造成了1500万人的伤亡）。劳动力的相对短缺在咆哮的二十年代（当世界经济的重构完成时）推高了实际工资。世界经济从战争时期

^① 我将永远记住我的朋友亚瑟·塞尔登（Arthur Seldon）失去父母的故事。从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塞尔登——与高十字勋爵哈里斯（Lord Harris of High Cross）一起——成为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IEA）的创始主席、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杰出成员、涉及主题广泛的伟大作家和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在塞尔登只有两岁的时候，他年仅30岁的父母在很短的时间内双双因为西班牙流感而去世。因此，在亚瑟·塞尔登还是个幼童的时候，就成了孤儿，后来被人收养。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设法克服了这种痛苦的经历，但是这给他留下了永久性的口吃，并在他的余生中一直伴随着他。这并没有阻止他成为英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保守主义革命的启发者。参见Arthur Seldon, *Capitalism* (Published by Wiley-Blackwell, 1991).

转向和平时期，整个过程伴随着巨大的信贷扩张，我们无法在此详细分析该扩张，但无论如何，它为 1929 年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萧条奠定了基础。^①

在历史的行程中，各种疫情实际上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例如，据估计，从 1348 年开始席卷欧洲的黑死病使总人口减少了至少三分之一。严重的、意料之外的劳动力短缺导致了实际工资的大幅增长，这种增长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占据了上风。令人气愤的是，货币主义者和——尤其是——凯恩斯主义者令人厌烦地叨唠他们认为的战争和疫情的“有益”经济影响（我想，这种有益是对于因战争和疫情而死亡或变得贫穷的数百万人之外的所有人而言）。有人认为，这些悲剧使经济体克服了沉睡，并开始了蓬勃发展的“繁荣”。同时，这种灾难为强烈的货币和财政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提供了理由。米塞斯凭借他的惯有洞察力，将这些经济理论和政策称为纯粹的“经济破坏主义”（economic destructionism），因为它们仅用于增加人均货币供应以及——尤其是——政府支出。^②

（二）生产结构与资本财货

除了对人口和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影响，我们还应考虑疫情对社会时间偏好率，进而对利率和资本财货阶段之生产结构的影响。可能发生的最灾难性的情景是薄伽丘（Boccaccio）在其《十日谈》（*Decameron*）引言中所描述的那一种，当时他描写了十四世纪困扰欧洲的黑死病。因为如果人们普遍相信每个人都可能在短期或中期内染病而亡，那么主观的评估被改变为立即消费，就可以理解了。“让我们吃喝，因为明天我们会死。”或相反，“让我们悔过、忏悔、祈祷，并让我们的精神生活井然有序。”这两种面对疫情的态度——彼此相反但又完全可以理解——具有相同的经济影响：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无法享受到它们的成果，那么储蓄和启动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成熟的投资项目有什么意义？显而易见的结果可以在十四世纪饱受鼠疫摧残的佛罗伦萨看到。群众普遍放弃了农场、牲畜、田地和作坊，并且，总的来说，他们对资本财货疏于照顾，消耗了它们而没有接替。^③如我的《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Money, 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s*）一书的“经济衰退的情况”一节所述，可以用简化的方式以图形来说明这种现象。^④在那里，我使用了著名的哈耶克三角形，它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生产结构。（有关其含义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291 页及其后的内容。）

^① 例如，参见 Murray N. 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5th ed.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0).

^② 例如，请参见卡洛·玛丽亚·西波拉（Carlo Maria Cipolla）在其著作 *The Monetary Policy of Fourteenth-Century Flor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中对十四世纪黑死病的影响的评论，以及我在 *Money, 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s*, 4th ed.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20), pp. 71-72（尤其是注释 56）中对其评论的批评。然而，在其 2011 年的文章《哦！多么可爱的战争！》（Oh! What A Lovely War!）中，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实际上曾经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政府支出大幅增加的影响进行的一次自然实验，因此对于那些支持采取积极主义方法应对经济不景气的人们来说，这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积极榜样（！）”。J.R. 拉耀（J.R. Rallo）在其为穆瑞·N. 罗斯巴德的著作《美国大萧条》*La gran depresión* (Madrid, Unión Editorial, 2013), pp. XXVI-XXVII. 所写的序言中引用了它。关于英文原文，请参见引用的著作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https://business.time.com/2011/08/16/paul-krugman-an-alien-invasion-could-fix-the-economy/>

^③ “……所有人，就好像他们那天都在寻死一样，竭尽全力地研究着，不是为了帮助他们的牲畜和田地的未来生产和自己过去辛辛苦苦的果实成熟，而是要消耗掉那些伸手可取的东西。” G. Boccaccio, the *Decameron*, Day the First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23700/23700-h/23700-h.htm#Day_the_First] 以及基于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的相关评论（*Capital and Time: A Neo-Austrian Theory*, Clarendon, Oxford, 1973, pp. 12-13），我在 Jesús Huerta de Soto, *Money, 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s*, 4th ed.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20), pp. 71-72 和 346 所做的评论。

^④ 同上，第 344-34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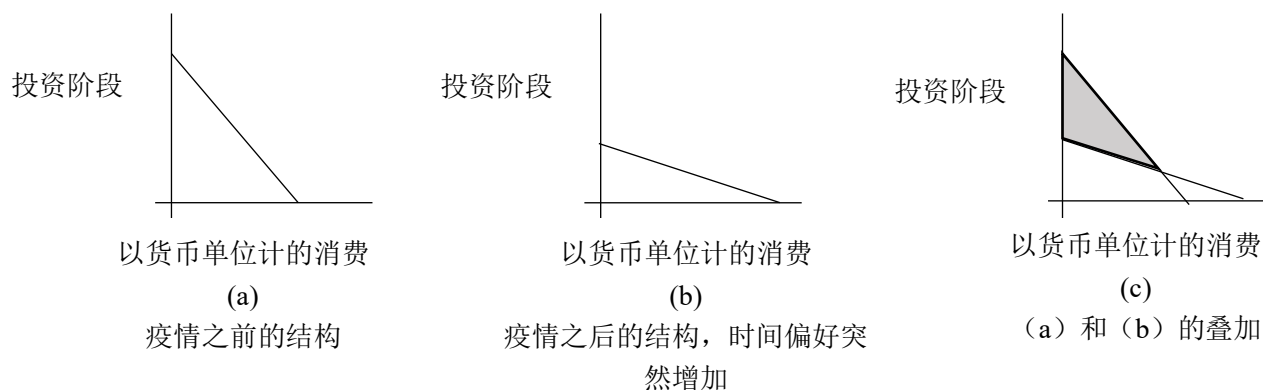


图 1

正如我们在图 1 中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时间偏好率突然、急剧的增加以牺牲投资为代价增加了即时货币消费（图 b）。具体来说，生产过程中的许多阶段（以图 c 中的阴影区域表示）都被放弃了，很大一部分人口停止了工作（由于死亡或自愿），幸存者认真地致力于消费消费财货（其价格——以货币单位计——由于其供应减少和货币需求的广泛减少而飞涨）。时间市场中的交易和可贷资金几乎停止，少数发生的借贷的利率急剧上升。

与上述情况相反，并没有迹象表明当前的 Covid-19 疫情伴随着社会时间偏好率的显著变化（除了不确定性暂时增加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首先，当前的情况绝不像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描述的那样致命。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劳动年龄人口的预期死亡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成功完成投资过程的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仍会保持不变。（例如，人们仍然在投资未来的电动汽车的设计、创新和生产以及许多其他长期投资项目。）而且，由于社会时间偏好率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在哈耶克图表中以简化方式描述的资本财货阶段的生产结构也保持不变，只是有以下三种影响：一种是短期的，另一种是中期的（一到三年），以及长期的（可能会变成无限期的）。

1. 首先，政府采取的强制性限制措施对实际生产结构产生了短期的影响（持续数月）。我们可以假设，相对而言，几个月以来经济停顿的减少主要影响了距离最终消费最远的那些生产性努力。毕竟，民众——甚至隔离在家中而无法工作的人——也不得不继续需要并消费消费财货和服务（即使他们得通过电子商务，例如亚马逊等——由于许多商店和最终分销商因其活动被视为“不必要”而被迫关闭）。如果是这样，并且假设用于消费的最终货币需求没有显著变化，要么是因为处于政府强制隔离的家庭已经动用了他们的金融储备，要么是因为他们依靠临时失业补贴（解雇补偿等）来弥补了收入的减少，那么以货币计的生产结构将在短时间内像钟摆一样波动，如下图所示（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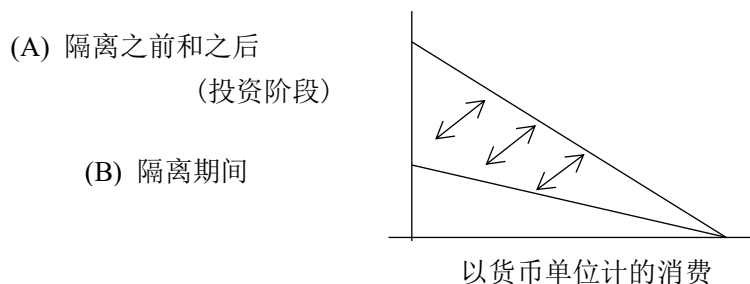


图 2

无论如何，当与生产过程的强制性“脱节”结束并且再次采用生产要素时，由于没有发现需要重组的系统性的、由不当投资造成的错误，因此生产过程可以从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始。^①与 2008 年大萧条中发生的情况不同，生产结构并未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因此无需进行冗长而痛苦的重组过程，也无需大规模重新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要素：企业家、工人和自我雇用者只需回到岗位，在中断的地方继续工作，并使用（几个月前）未受损坏且现在仍然可用的资本设备。

关于短期内的第一种影响，我应该澄清的是，如果隔离是自愿的和有选择性的，并且是在自由社会的背景下（在这种情况下，要么不存在垄断政府——相反，我们有无政府资本主义的自治，要么它们不是中央集权的，并且不会施加广泛的、强制性的和不加区分的隔离措施。）由家庭、公司、居民区、社区等在“微观”水平上做出决定的，这种影响也会出现——尽管它会温和得多，创伤较小，因此引起的波动要比图中反映的摆动小得多。

2. 其次，在隔离后，与最终消费阶段从根本上相关的各个部门的需求仍在急剧下降，并且可能会持续数月，直到疫情结束并且活动完全恢复正常为止。^②这些行业主要涉及旅游业、运输业、酒店业和娱乐业，相对而言，它们对某些经济体（例如西班牙，其旅游业几乎占 GDP 的 15%）非常重要。与上述第一点所述的仅摆动波动相比，这些部门需要更深远的变化。相反，经济状况会导致这样一种变化，它对生产结构的影响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大约两年）。显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家庭在航空运输、酒店、餐厅和剧院表演方面的支出减少，他们将在替代性消费财货和服务（或替代品）上花费更多，他们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投资，或者他们的现金余额会增加。除了货币需求可能增加（稍后我们将在考虑不确定性时进行讨论）之外，显然，生产结构将不得不通过充分利用（至少部分地）受影响的部门中剩余的有效资源来暂时适应新情况。我特别指的是那些曾经是非自愿地未被利用的（involuntarily unemployed）资源，必须将这些资源重新分配到其他生产线，使它们能获得多产的（临时的或最终的）利用。

举例说明，某些餐厅会通过调整其产品（例如准备送餐上门的餐食）、降低成本（裁员，或者直接或间接地对其进行重新培训——例如，成为外卖员）来突破万难并保持营业，并调整他们对供应商的责任，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和资本消耗。这样，所有者就不必丢弃掉花在建立声誉和积累（难以改变用途的）高价值资本设备上的大量时间。并且，他们希望，当情况变化时，他们将比竞争对手处在更好的位置，并且在应对该行业预期的新复苏时具有巨

^① 当然，我这里不是指疫情之前已经存在且仍在等待清算或重组的错误。

^② 就“西班牙流感”而言，这一时期持续了两年多一点。至于当前的 Covid-19 疫情，尽管有疫苗，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的持续时间相似，尽管可能会提前几个月结束。

大的竞争优势。相比之下，其他企业家将选择退出并“休眠”，方法是暂时关门，但留出相应的设施和业务联系，以便在情况允许时尽快恢复营业。另一类商人——通常来说，即使在疫情之前的情况下，这些商人的企业家项目在边际上也不那么赚钱——将被迫永久性关闭其业务并清算其各自的企业家项目。

所有这些企业家活动和决策都可以而且必须相对迅速地进行，并且必须将成本降到最低。这只有在一个动态有效的经济中才有可能实现，这种经济鼓励企业家精神的自由施展，并且不会受到有害监管（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和不利税收的阻碍。显然，将设法在每个时刻以及每种时间和地点的特定情况下做出最适当决定的将不是政府和政府官员。相反，将是一支由企业家组成的大军，他们尽管经历了种种逆境，仍然希望前进，并怀着勇气和对美好未来不可动摇的信心，相信它迟早会到来。

关于我们以简化的方式来表示生产结构的三角形，假设社会时间偏好率没有显著变化，我们最能描绘（参见图 3）的是斜边的水平波动，首先到左边，这表明受影响部门（以及这些部门的供应商）的需求下降的整体影响，然后回到右边，因为它恢复完全正常状态并且这些部门失去的大部分货币需求都得到恢复所花费的几个月时间里，它被新需求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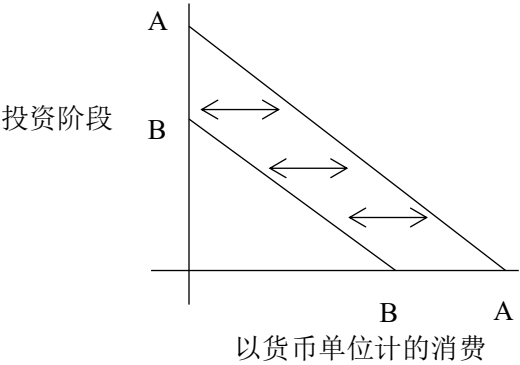


图 3

显然，该图不允许我们显示无数的企业家决策和实际投资交易，这些决策和交易导致双向箭头所示的快速而灵活的水平波动。但是，该图表的确使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推出政策时所涉及的严重风险，这些政策往往会通过维持本应尽快被清算的僵尸公司，并通过监管和税收使得发生反弹并将三角形的斜边推回右侧变得更加困难，从而让生产结构更加僵化。实际上，财政和监管上的干预可以无限期地将实际生产结构固定在 BB 位置，并防止其反弹回 AA 位置。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快速调整和恢复过程都需要一个高度敏捷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在该市场中，可以非常迅速地以最少的成本解雇和重新雇用人员。我们必须记住，与 2008 年大衰退中发生的情况（通常发生在信贷经过漫长的扩张之后的任何金融危机之后）不同，在当前的疫情中，我们并不是从对生产要素的广泛不当投资开始的（例如，在建筑业，就像 2008 年发生的情况），这可以解释大量长期的结构性失业。相反，现在有可能以一种快速、可持续和永久性的方式重新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要素，但是相应的劳动力和要素市场必须尽可能地自由和敏捷。

3. 第三，我们尚未分析这一可能性，即人口的消费习惯可能发生某些变化，这些变化会变成永久性的，并要求永久性修改社会对资本财货投资阶段的生产结构。我们应该指出，在任何不受控制的市场经济中，生产结构总是以一种渐进的、非创伤性的方式来适应消费者口味和需求的变化。的确，疫情可能会加速大多数消费者对某些新行为习惯（例如，有关对电子商务的广泛参与，某些付款方式的使用增加，以及视频会议在商业和教育领域的主流化，等等）的发现和最终采用。但是，实际上，我们可能会夸大这些所谓的根本性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如果我们将它们与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发生的变化进行比较，这些变化既来自贸易和交易的进一步全球化，也来自伴随着它并使之成为可能的技术革命。这些发展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迄今为止仍被排除在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生产和贸易市场之外的数十亿人（尤其是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人）已被纳入生产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被释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尽管存在着国家干预和监管的负担，这些负担不断阻碍进步并束缚其发展，人类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就，即拥有 80 亿人口并维持着几十年前无法想像的生活水平。^①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此背景下，即市场经济正在没有发生重大困难的情况下不断适应更大、更深刻的变化，我们应该公正地对当前疫情的长期影响赋予较低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应该再次将分析的重点转向研究当前疫情的短期和中期影响——由于它们离我们更近，我们现在可以认为它们更重要。

（三）不确定性与货币需求

为了总结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现在将考虑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正如我们将在最后一部分中看到的那样，在采用这种方法时，我的主要目的是要强调这一事实，即这种不确定性导致进一步促进了财政和（尤其是）货币干预政策，它们史无前例地宽松，构成了严重威胁，一旦当前的疫情结束，很可能继续造成严重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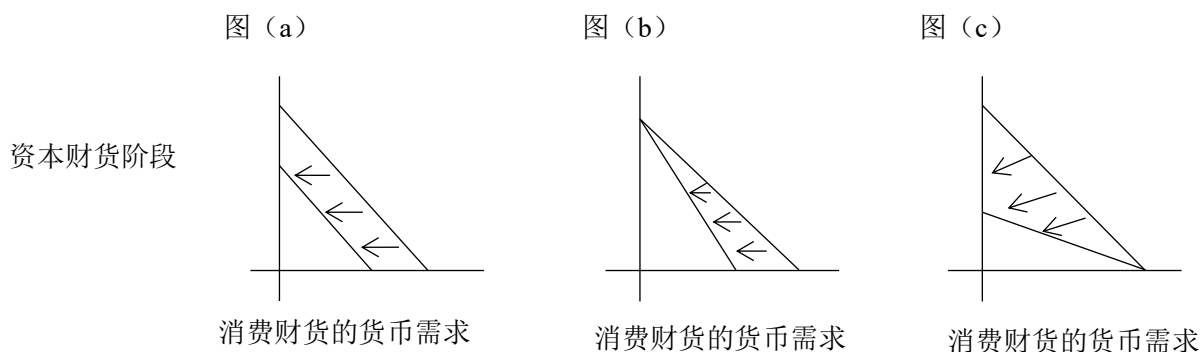
首先，疫情对不确定性——以及因此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可能介于两个相对的极端之间。一次疫情可能会非常致命，正如我们在 14 世纪中叶佛罗伦萨发生的鼠疫中所看到的那样（薄伽丘在《十日谈》中非常好地对其进行了描述），它给一大批人带来的不仅仅是不确定性，而是确定性，即他们的日子不多了，因此，他们的预期寿命大大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理解的是，在没有人愿意放弃财货或提供服务——其生产已大幅下降——且大多数人都希望尽快消费它们的情况下，对货币的需求崩溃了，货币失去了许多购买力。

现在，对我们而言，更具分析意义的是像当前这样的疫情（其危害性要小得多，并且，在这样的疫情中，尽管大多数人没有性命之忧，但不确定性的确在加剧，尤其是在最初的几个月）的传播广度、演变和速度，及其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影响。现金余额是应对未来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的典型手段，因为它们使经济行动者和家庭能够保持所有选择的余地，从而在出现任何未来情况时能够非常快速、轻松地进行调整。因此，可以理解的是，由当前的疫情引起的不确定性的自然增加伴随着对货币需求的增加，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购买力也随之增加。图 4 可以帮助我们将其可视化。该图包含几个三角图，这些三角图表示以货币需求计的生产结构。这些图将货币需求增加的影响描述为：当时间偏好率不变时，斜边向左匀速移动（图 a）；当通过减少消费积累现金余额时，反映更大相对投资的向左移动（图 b），当通过出售资本财货和金融资产而不是减少消费来积累新货币时，反映更大相对消费的向左移动（图 c）。

^① 在众多研究中，参见 Hans Rosling, *Factfulness* (London: Sceptre, 2018).

图 4

疫情引起的货币需求增加对生产结构产生三种可能的影响：



尽管这三种影响中的任何一种在理论上都是可能的，但在当前情况下最可能是它们的组合，尤其是在图 a 和 b 中反映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图叠加到我们在前几节的图中分析过的那些图上。为了使这些初始图表更易于理解和单独考察，我们没有考虑货币需求可能增加的影响，现在我们将其包括在分析中。关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货币需求的增加，需要牢记三个要点。

首先，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需求的增加）是暂时的且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因为一旦我们开始看到隧道尽头的光，出现了对改善的期望，它就会趋于恢复。因此，没有必要等到我们完全克服疫情之后（大约两年）。在此之前，不确定性将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图 a、b 和 c 中描述的运动将改变方向，以货币计的生产结构将恢复到先前的状态。

第二，由于随着对消费财货需求的减少，新的货币余额不断累积（图 a 和 b）——这种情况确实发生在受流动性（mobility）限制最严重的行业（旅游业和酒店业等）中——因此对消费财货的较低货币需求将趋向于使大量消费财货无人购买。结果，既有可能解决他们的生产增长放缓（这是由于不可避免的瓶颈，以及其生产者所受的或多或少的隔离），又有可能解决在疫情影响的最初几个月中完全或部分停止工作的所有人继续消费所产生的需求。因此，对于由于强制性隔离而在消费财货生产中发生的供应冲击，货币需求的增加成为重要的吸收器。因此，以这种方式，防止了这些财货的相对价格飞涨——这种飞涨将严重损害最广泛的人口阶层。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我们必须指出，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货币、财政和税收干预主义可以进一步增加不确定性，并且实际上可能将不确定性延长至超出严格必要和仅仅是疫情所需的范围。毫无疑问，正如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中更详细地看到的那样，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创造一种额外的企业家疑虑氛围，这会阻碍市场的快速复苏并阻碍企业家恢复正常状态的过程。它甚至有可能以这种方式复制我在自己的《欧盟的日本化》（The Japaniz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一文中仔细研究过的不正当反馈回路。^①在这种不正当回路中，中央银行大量注入货币供应并将利率降低至零，这不会对经济产生引人注目的影响，并且是自欺欺人的。这是因为，它们被零机会成本持有流动资产，尤其是更严格的经济监管政策、对即将进行的结构改革的进一步阻止、提高税收、干预主义以及缺乏财政和货币控制所导致的不确定性的进一步增加所中和了。

疫情：系统性的政府官僚主义以及强制与自发的社会协调

（一）中央计划的不可能性定理及其在当前危机中的应用

世界上不同的政府和公共机构（特别是我的祖国西班牙的）对 Covid-19 疫情的出现和演变的反应，它们接连采取的干预措施，以及对这些措施的效果的监控，为任何希望观察和验证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一百年前首次阐述的“中央计划的不可能性定理”的实质内容和主要含义，并将其应用于一个离我们非常近且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历史案例的经济理论家提供了独特的机会。^②的确，前苏联和现实中央计划的瓦解，再加上福利国家的危机，已经在关于中央计划的不可能性的历史性辩论中充分说明了奥地利学派分析的胜利。但是，Covid-19 疫情的悲剧性爆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现实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离我们更近、更具体的例子，它可以很好地说明并证实该理论的含义，即：从理论上讲，无论这些命令看起来多么必要，它们的目标多么崇高，或为成功实现目标而付出了什么样的真诚和努力，中央计划者都不可能为他们的命令提供协调的质量。^③

当前疫情——影响了所有国家，无论其传统，文化，财富或政治制度如何——的全球影响凸显了米塞斯定理（我们可以适当地称其为“国家主义的不可能性定理”）对国家使用的任何强制性干预措施的普遍适用性。的确，各国政府采取的干预主义措施差异很大。但是，尽管某些政府在应对危机上可能比其他政府更好，但差异实际上更多是程度上的而非类别上的，因为各国政府无法让自己脱离其 DNA 中本质上的强制。实际上，强制是它们最基本的特征，每当它们行使它，并且，正是在它们行使它的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该理论所预测的所有负面影响。因此，不仅仅是有些当局比其他当局更无能（尽管在西班牙确实如此^④）。相反，当所有当局坚持通过使用权力和强制性命令来协调社会时，它们注定要失败。这也许是经济学理论必须传达给民众的最重要的信息：无论国家当前的政客表现如何，问题总是来自强制性国家权力的行使。

尽管本文大体上讨论的是疫情的经济分析，但我们将几乎完全从“国家主义-中央计划的不可能性定理”的角度专注于当前疫情的影响。原因有两个：首先，从当代读者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疫情在时间上更近，并具有对私人的影响。其次，在其他疫情中采用的干预模型现在在历史上与我们相去甚远，尽管我们可以识别出我们最近观察到的许多相同现象（例如

^① Jesús Huerta de Soto, “The Japaniz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Mises Wire*, Mises Institute, Dec. 11, 2019. [<https://mises.org/wire/japanization-european-union>]

^② Ludwig von Mises, “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no. 47, 1920, pp. 86-121.

^③ 从苏联的最后几年，铁幕的另一侧，我们在 1986 年 4 月 26 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中，发现了另一个具体的历史例证。由 HBO-SKY 从 2019 年开始制作并分五集播出的电视短剧《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描写了很多对事故的分析和评论，并且令人钦佩地介绍了背景和关键事件。该剧已成为历史上评分最高的剧集。

^④ 例如，参见 Mikel Buesa, *Abuso de poder: El coronavirus en España. Incompetencia y fracaso en la gestión de la crisis* [Abuse of Power: The Coronavirus in Spain: Incompetence and Failure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risis] (Madrid: Marcial Pons, 2020).

1918 年流感疫情期间盟国对信息的操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被糟糕地称为“西班牙”流感），但如今它们作为理论分析的例证显然只提供了较少的附加值。

正如我在我的《中央计划、经济计算与企业家精神》一书（尤其是直接适用于此处的第 3 章^①）中详细解释的那样，经济科学表明，从理论上讲，国家不可能以一种动态有效率的方式运作，因为它永远沉浸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无知中，从而使它无法在其命令中注入协调质量。这主要是由于下列四个因素（从最不重要到最重要）：

首先，为了真正协调其命令，国家将需要大量的信息和知识——并不是技术或科学知识，尽管它也需要，而是关于无数时间和地点的特定的、个人的情况的知识（“实践”知识）。其次，这些重要的信息或知识本质上是主观的、隐含的、实践的和不能言说的，因此无法传递给国家中央计划和决策机构。第三，这种知识或信息不是给定的或静态的，而是由于人类天生的创造能力和周围环境的不断波动而不断变化的。这对当局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们总是迟到，因为一旦它们消化了它们收到的稀缺的、片面的信息，它就已经过时了；而且它们无法用未来的命令来达到目标，因为未来取决于因为尚未被创建所以尚未出现的实践信息。最后，第四点，让我们回想一下，国家是强制性的（这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因此，当它在社会的任何领域以武力强加其命令时，它就会阻碍甚至阻止国家为了使其命令有协调的质量而迫切需要的知识或信息的创建和出现。因此，国家主义干预主义的巨大悖论，是因为它总是倾向于产生与预期结果相反的结果。^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大规模地在左右两边都看到：不适应和失调的出现；当局系统性地不负责任的行动（它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就它们不拥有的信息和决策的真实成本而言，它们是多么的盲目）；当局试图调动和控制的资源持续缺乏、短缺和质量低劣；操纵信息以在政治上拔高自己；以及法治基本原则的腐败。自从疫情爆发和国家动员起来抗击它以来，我们已经观察到所有这些现象，它们不可避免地以链状的方式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我再说一遍，这些现象并非源于政府当局的不当行为，而是一个基于系统性地使用强制来计划和尝试解决社会问题的系统所固有的。

例如，根据我们正在讨论的关于国家主义的不可能性的理论分析，我建议读者们阅读何塞·曼努埃尔·罗梅罗（José Manuel Romero）和奥里奥尔·居尔（Oriol Güell）所写的研究文章《关于疫情的白皮书》（El libro blanco de la pandemia）。^③这篇文章逐步地说明了国家主义的几乎所有不足和缺陷，即使作者（其职业为记者）天真地相信他们对事件的描述将有助于防止将来犯下同样的错误。他们无法理解所讨论的错误并非主要源于政治或管理错误，而是源于监管、计划和强制的国家制度背后的基本原理，而这些制度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触发相同的失调、无效率和不公正的后果。众多例子中的一个（我们可以举出事件的时间顺序，作者已完美地重构了这些事件）是，从 2020 年 2 月 13 日开始，瓦伦西亚阿瑙·德·比拉诺瓦（Arnau de Vilanova）公立医院的医生们未能获得地区（和国家）卫生当局对样品进行冠状病毒测试的授权（这些样品采集自一名 69 岁的患者，他死于被怀疑是由 Covid-19 引起的症状），从而损失了宝贵的几周时间。他们面对着一个残酷的现实：相应的中央卫生计划机构（位于马德里的卫生部和地区卫生厅）一再拒绝授权进行测试。

^① Jesús Huerta de Soto, *Socialism,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10), especially pp. 49–98.

^② “这样，这种无法解决的【国家主义】悖论产生了：管理当局越是坚持计划或控制社会生活的某个领域，它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它无法获得必要的信息来组织和协调社会。实际上，只要有效利用强制并限制人们的企业家能力，它就会引起新的、更严重的失调和扭曲。”同上，第 58 页。

^③ 由《国家报》（*El País*）于 2020 年 6 月 14 日和 21 日分期出版。

试，因为怀疑被感染的患者（许多周后被证明死于 Covid-19 病毒）不符合当局先前（1 月 24 日）所设定的条件，即：在症状发作前的十四天内去过疫区或与被诊断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接触过。显然，在去中心化的自由企业体系中（其中有关行动者的创造力和主动性没有受到限制），这种巨大的错误不会发生，我们将获得关键的几周的知识价值。我们就该知道该病毒已在西班牙自由传播，并且可以了解有关预防措施和抗击疫情的方法。（例如，有可能取消 3 月 8 日的女权示威游行。）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米克尔·布萨（Mikel Buesa）的非凡著作^①（尤其是在第 118 页及其后）所呈现的一系列错误、失调、腐败、操纵信息、侵犯权利和谎言，这些都是自然而不可避免地源于——在不同层次上的——试图控制疫情的国家活动。例如，“……可以理解的是，西班牙制造商将没收医疗物资的命令解读为对他们商业利益的攻击，其结果是生产和进口的停顿”（第 109 页），而当时正迫切需要维护医生和卫生人员（他们每天都要在没有必要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工作）的健康。同样，海关依国家命令的没收，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口罩订单流失，当时相应的供应商由于担心政府可能没收货物而倾向于将其发送给其他客户。众多情况中还有一种，即加利西亚制造商的情况，它们的材料被国家命令冻结在仓库中，但没有人索取它们（第 110-111 页）。此外，还有一些专门从事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试剂生产的西班牙公司，其库存和生产均被国家征用，因此，这些公司每天不能生产超过 60000 支 PCR 试剂或满足国内外需求（第 119 页）。而且，由于缺乏用于收集样品的棉签——如果允许西班牙生产者自由经营，这个问题可以立即得到解决——而造成的瓶颈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第 114 页）。由于国家监管和最高价格的设定，面罩、洗手液和丁腈手套的市场普遍存在短缺，并且这是在病毒传播最迅速的几个月中（第 116 页）。^②自 3 月以来，在采购的 9.71 亿件不同产品（口罩、手套、罩衣、呼吸装置、诊断设备等）中，到 2020 年 9 月实际上只分发了 2.26 亿件，其余的则被搁置在各个仓库中（第 118 页）。这份清单在一份无尽的目录中不胜枚举，该目录类似于对（存在于 20 世纪前苏联的生产和分配中，并导致始于 1989 年的政权彻底崩溃的）系统性无效率的描述。^③我再说一遍，这并不是由于我们当局缺乏努力、管理甚至是真诚，而是由于它们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尽管我们的政府首脑中有哲学教授，甚至有经济学博士）。因此，在紧要关头，它们选择了一——当局总是会这么做，因为这正是它们在国家框架内的角色——强制、监管、没收等，而不是经营、生产和分销的自由以及支持而非阻碍私人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的自由行使，就并不令我们感到惊讶了。

（二）理论预测的国家主义的其他附带影响

^① Mikel Buesa, *Abuso de poder: El coronavirus en España. Incompetencia y fracaso en la gestión de la crisis*, op. cit. 然而，布萨教授将错误更多地归因于无能，而不是体制本身。在他本可以完成的杰出著作的最后一部分，实际上，他提出的唯一建议（关于劳动力市场除外）是采取其他积极的国家政策，以改善工作方式和克服危机（！）。这还不包括他在第 203 页对危机所作的凯恩斯主义错误解释。

^② 众所周知，最高价格会导致短缺、稀缺和黑市。当出现对产品的紧急需求（例如口罩）时，唯一明智的政策是放开价格，使价格尽可能上涨，并鼓励大规模生产，直到满足增长的需求并解决问题为止。经验表明，价格很快就会恢复到先前的水平（并且，无论如何，会在政府干预实现必要的产量增长之前——与自由市场中发生的情况相比，它总是一点点地晚到，并且质量低劣）。因此，关于高昂的价格不公平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替代方案要糟糕得多：时间长得多的短缺、黑市和劣质。为了确保最弱势的人们可以尽快以低价购买口罩，必须首先允许价格上涨至市场确定的水平。

^③ 在我写这几行时，我们所见到的所有这些问题再次出现在向整个人群分发和管理 Covid-19 疫苗的缓慢、混乱的过程中。（公共机构也完全垄断了这一过程，并且完全将私营企业排除在外。）请参见 Hans-Werner Sinn, “Europe’s Vaccination Debacle,” *Project Syndicate*, Jan. 18, 2021.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urope-vaccine-scarcity-central-planning-by-hans-werner-sinn-2021-01?barrier=accesspaylog>]

除了不适应、失调、不负责任的行动以及缺乏经济计算的基本后果外，国家主义还带来了其他的各种负面影响，这在我的《中央计划、经济计算与企业家精神》一书的第3章中也有介绍。^①国家主义和体现它的当局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不仅试图利用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是疫情造成的危机）来保持权力，还要增强权力，为此目的，它们会通过政治宣传以操纵甚至系统地欺骗公民。^②

关于西班牙，我们引用的著作记录了多个谎言，这些谎言已通过政治宣传的形式有计划地、系统性地散布，以操纵和欺骗公民，使他们无法评估政府管理的真实成本。在这些谎言中，由于其重要性，我想强调以下几点：第一，真正的死亡人数。（根据米克尔·布萨的说法，迄今为止，仅报道了近90000的总数的56.4%——第76页。）其次，真正感染的总人数（根据疫情的阶段而有所不同，是所报告病例数的五至十倍）。第三，政府故意在2020年3月底向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提供了夸大了50%的虚假数据，涉及所派发的PCR试剂的数量（355000支而不是实际的235000支），此数据后来被政府公开用来吹嘘西班牙是测试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例如，见布萨的书第113页）。

我们必须牢记，国家（尤其是其政府）始终致力于通过一种**粗放而唯意志**（voluntaristic）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③“唯意志”是指它们希望仅通过强制性意志以命令和法规的形式来完成其拟议的目标。“粗放”是指仅根据最容易衡量的参数来判断所追求目标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令人惊讶的是，死亡人数被官方统计数字低估了将近一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至于对法律和司法的滥用（这是中央计划的另一种典型附带影响），^④布萨详细记录了对权力的滥用以及对警报状态的不当而违宪的使用，当时的适当行动是宣布一种真正的紧急状态，伴随着宪法规定的所有针对政府控制的保护措施。因此，“法治”（rule of law）和宪法的基本内容都被忽略了（布萨，第96-108页和122页）。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依赖于国家并与其串通一气的科学家、“专家”和知识分子的整个合唱团。他们依赖于政治体制，并致力于为此产生的每项决定提供所谓的科学支持。这样，他们利用科学的光环解除了民间社会的武装并使之无助。实际上，“社会工程学”或科学中央计划是国家主义的最典型和最不正当的表现之一，因为，一方面，它旨在证明以下观点的合理性：由于专家们据称具有较高的培训水平和知识水平，因此有权指导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通过简单地提及所谓的科学支持来阻止任何抱怨或反对。简而言之，政府使我们相信，由于据称科学顾问相对于普通公民具有更大的知识和智识优势，政府有权通过强制性命令使社会适应他们的喜好。在其他地方，^⑤我写过有关这种“权力狂欢”所引发的一系列错误——“专家”和技术人员的致命的自负助长了这种错误——的信息。反过来，这种致命的自负的根源在于这一根本错误，即认为社会过程中的行动者不断创建和传播的分

^① Jesús Huerta de Soto, *Socialism,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p. cit., pp. 62-77.

^② “任何中央计划制度都倾向于过度沉迷于政治**宣传**，由此它会总是理想化统治主体的命令对社会进程的影响，同时坚持认为没有这种干预将给社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对民众的系统性欺骗、对事实的歪曲……让公众相信权力结构是必要的，应该予以维持和加强，等等，都是中央计划对其自身的统治主体或机构施加的不正当和腐败作用的典型特征。” Jesús Huerta de Soto, *Socialism,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p. cit., p. 68. 政府行动再次反映在前面提到的迷你剧《切尔诺贝利》所总结的令人不安的问题上：“谎言的代价是什么？”

^③ 同上，第66页。

^④ 同上，第71-76页。

^⑤ 同上，第80-82页。

散的、实践的信息可以通过科学手段以一种中心化的方式被了解、表达、存储和分析，而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①

（三）疫情：自由社会与市场经济

我们无法先验地知道，一个不受国家干预主义的系统性强制所束缚的自由社会将如何应对像当前这样严重的疫情。像现在一样，社会肯定会在健康和经济领域感受到深远的影响。但是，社会的反应显然取决于企业家的创造性。寻找解决方案以及为发现和克服问题而付出的努力将是动态有效的。正是这种企业家创造性的力量，使我们无法知道将要采用的解决方案的详细信息，因为我们无法在今天得知尚未被创建出来——因为垄断性的国家强制阻止了它的创建——的企业家信息，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放心，问题往往会被非常灵活、高效地检测 and 解决。^②换句话说，正如我们一直在分析的那样，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我们所看到的与国家及其政客和官僚的联合行动完全相反的方式，不管他们付出什么样的真诚和努力。尽管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为了应对自由社会里的疫情所带来的问题而集结出的巨大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独创性，我们有许多迹象，至少可以让我们对在没有国家胁迫的环境中出现的完全不同的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③

例如，相比全面的隔离以及随之而来的强制性经济停顿，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措施本质上将更加去中心化、分散和“微观”的，例如（私人）住宅区、街区、建筑物、公司、疗养院等的选择性隔离。相比在疫情开始的关键几周内实施审查（以及对那些揭露它的人进行骚扰），信息将自由而有效地高速传播。相比通过测试来监测可能案例时的缓慢和笨拙，从一开始，医院、疗养院、机场、车站、运输工具等的企业家和所有者就将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客户的利益，以极大的敏捷性立即引入这些测试。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和一个自由的市场中，除非极个别的情况，否则不会出现严重的短缺和瓶颈。使用口罩不会（在全世界一半人已经使用口罩并取得良好效果时）遭到反对，也不会在随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被强加于人。企业家的独创性将以多中心和竞争性的方式专注于测试、发现和创新解决方案，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专注于通过垄断性的中央国家计划来阻止和破坏人类大多数的创造潜力。^④而且，我不必提及个人主动性和私营企业的巨大优势，也不必提及它们在研究和发现补救措施和疫苗方面的运作方式有何不同；因为即使在目前的情况下，当面临着庞大而资金充裕的公共研究机构无法提供有效、及时的解决方案的巨大失败时，各国也不得不求助于它们迅速

^① 专家和当局通常将干预主义造成的持续失调归因于公民“缺乏合作”，这些失调被用作新的制度性强制措施的新理由，以渐进、极权地增加权力，在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通常伴随着持续的“……动荡或政策突然变化，对命令内容或命令所适用领域的根本修改，或两者皆有，所有这些都是徒劳的，希望具有新型干预手段和程度的系统性‘实验’将为所考虑的不可解决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也许关于口罩——最初是专家劝告反对的，然后仅两个月后就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并宣布即使在户外也是强制性的（！）——的可耻情节为这一点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证。参见 Jesús Huerta de Soto, *Socialism,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p. cit., p. 64. 另见“Macron y la vacunación,” *El país*, Sunday, Jan. 10, 2021, p. 10. 此外，我还要提到公共机构对疗养院居民造成的悲惨歧视，或者说，在疫情的最危险时刻，通常是由公务员（公立医院的医生）来决定严重感染 Covid-19 的患者是否应该活下去。

^② Israel Kirzner, *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t Proces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 168.

^③ 例如，私人公司 Inditex (“Zara”) 使用其在中国的物流和运输中心，使得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将超过 3500 万台的防护性保健设备（连同 1200 台呼吸机）带到西班牙，如果使用通常的公共渠道，这些设备将在更晚到达并且状况更糟。此外，获得米其林两星级评价的餐厅“Coque”，在马德里为成千上万有需要的人和受疫情影响的人准备并提供了数千份餐点。

^④ 除其他文章外，参见哈耶克 (F.A. Hayek) 的经典文章，“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in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Routledge, 1978).

获得这些东西。^①关于私人医疗保健网络（医疗保险公司、私人医院、宗教机构、各种基金会等）的更高的敏捷性和效率，可以说同样的话，在危机时期，它们具有更快地扩展、更具弹性的额外可能性。（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回顾一下，有趣的是，在西班牙，近 80% 的公务员本身——包括中央计划政府副总统在内——自由地选择了私人卫生保健而非公共卫生保健，而其同胞则被公然拒绝了这一选择；并且，即使如此，他们中至少有 25% 做出了支付私人医疗保健政策的额外费用的牺牲。）诸如此类……^②

（四）公民的奴役与服从

作为本节的总结，也许我们最好问一下，尽管经济分析揭示了国家管理中固有的所有缺陷、不足和矛盾，^③但为什么在其政客和公共当局的引诱下，大多数公民还是会有纪律而顺从地继续服从它们？埃蒂安·德拉博埃蒂（Etienne de la Boétie）于 1574 年发表他的《自愿奴役论》（*Discourse of Voluntary Servitude*）时，^④提出了四个因素来解释公民对统治者和当局的奴役性，这些因素甚至在今天仍然是完全相关的：服从的习俗虽然起源于部落和家庭，却被推广到了整个社会；具有“圣”印（过去是神选；今天人民主权和民主支持）——这将使所谓的服从义务合法化——的政治当局的常年自我介绍；永久性创造出大批坚定的忠诚拥护者（过去是禁卫军成员；今天是专家、公务员等），他们依靠政治体制来维持生计，不断地支持和维持它并在其身后集结；简而言之，就是通过不断给予补贴（过去是津贴和奖励；今天是例如“福利国家”的救济金）来获得民众的支持，这使公民渐进而不可逆转地依赖于政治体制。如果在此基础上加上恐惧（由国家本身引起），这种恐惧会导致人们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特别是在严重危机（战争、疫情）时，我们就能理解公民的顺从行为是如何成长并得到加强的，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只要我们从理论或哲学的角度开始深入研究，就会很清楚地发现，国家所拥有的特殊权威缺乏道德和伦理上的正当性。许多人，包括迈克尔·休默（Michael Huemer）在其《政治权威问题》（*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Authority*）中，已经证明这是事实。^⑤显然，我们在这里不能深入研究这个严肃的问题，它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时代）的主要社会危机的根源。但是，在对疫情进行经济分析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存在着一种“病毒”甚至比引发当前疫情的病毒更为致命，它不是别的，正是“感染了人类灵魂，并传播到我们所有人”的国家主义。^⑥

^① 各国政府继续实行双重标准，并立即谴责私营部门的任何失败（无论多么小），同时将公共部门的更为严重和过分的失败视为明确的证据，证明没有花费足够的资金，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公共部门，增加公共支出和税收。

^② 显而易见，那些干预和胁迫其公民相对而言少一些的公共当局（例如在香港、韩国、新加坡，或者更接近我们的马德里自治区）虽然并不能完全摆脱国家干预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它们往往取得了相对积极的结果。因此，这是要添加到正文中已经提到的内容的另一种指示或说明。顺便一提，俗话说“西班牙的一半致力于监管、检查和罚款另一半，”此言不假。因此，隔离和彻底停顿的至少一个积极效果就是，民间社会几个月来至少从这种压力中得到了喘息。

^③ 在正文中我没有提到公共选择学派的贡献，它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由于民主公共管理的失败（尤其是选民的理性无知，特权特殊利益集团的正当作用，政府的短视和短期主义以及官僚机构的狂妄和低效本性的影响）而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当时其主要的缔造先驱詹姆斯·M.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于 1986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贡献直接适用于此处。（另请参见我在 *Socialism,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一书第 93 页，注释 27 中引用的参考书目。）

^④ 除其他版本外，请参见 *The Politics of Obedience: The Discourse of Voluntary Servitude* (Auburn AL: Mises Institute, 2002). 西班牙语也有多种版本，例如 Pedro Lomba 的版本，该版本于 2019 年 9 月由 Editorial Trotta 在马德里出版。

^⑤ Michael Huemer,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Authority: An Examination of the Right to Coerce and the Duty to Ob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这个副标题是非常发人深省的。

^⑥ Jesús Huerta de Soto, “Il virus più letale,” *Il Giornale*, Milan, May 14, 2020, pp. 1 and 24. 英语版, “The State: The Deadliest Virus,” *Mises Wire*, Mises Institute, June 24, 2020. [https://mises.org/wire/state-deadliest-virus] 意大利语版之后的西班牙语版, “El virus

疫情是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日益缺乏财政和货币控制的借口

（一）动态效率是经济从疫情中复苏的充要条件

任何受到疫情影响的经济体都需要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首先使经济体以尽可能低的成本适应新情况，一旦疫情被克服，就可以开始健康、可持续的复苏。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们考虑了短期、中期和最终长期的疫情可能引起的结构性影响，以及（由疫情引起的）不确定性的自然增加最初在货币需求及其购买力的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在（局部或一般）隔离的背景下，生产活动暂时停止，特别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需求减少，以释放消费财货和服务，这样所有被迫暂停生产或工作活动的人都可以继续消耗他们所需的最小量。换句话说，现金余额的增加和名义价格的下降使消费者和经济主体更容易适应困难的情况，同时，它们使所有人都能快速响应，一旦他们看到隧道尽头的光，信心就会恢复。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经济要发现开始出现的机会，并使其有可能被抓住并让复苏起步，经济必须是“动态有效的”^①。动态效率的条件由一切允许和促进所有经济主体自由行使（既有创造性又有协调性的）企业家精神的事物提供，这样，这些经济主体就可以将可用的经济资源用于新的、有利可图的和可持续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专注于生产财货和服务，它们满足了公民的需要，并且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都是公民的独立需求。在像我们当前这样的，高度受控的经济的环境中，形成和设定自由企业系统的价格特征的过程必须平稳、灵活地进行。为此，我们必须消除所有使经济僵化的监管，尽可能地开放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市场。此外，至关重要是公共部门不要浪费公司和经济主体首先需要的资源，以应付疫情的灾难并生存，然后在情况改善时，利用其所有积蓄和闲置资源带来复苏。因此，当务之急是全面降低税收，这将尽可能多的资源留在公民的口袋里，最重要的是，尽可能降低对企业家利润和资本积累的任何税收。我们必须记住，利润是引导企业家从事其必不可少的、有创造性和协调性工作的基本信号。利润指导他们寻找、开展和完成有利可图的、可持续的投资项目，从而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如果我们希望使工人阶级，特别是最弱势的工人受益，就必须促进而不是从财政上惩罚资本的积累。这是因为，他们赚取的工资最终取决于他们的生产力，而企业家以设备财货的形式提供给他们的数量和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人均资本量越高，他们的生产力就会越高。关于劳动力市场，我们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形式的监管，这些监管会降低劳动力的供应、流动性和充分利用能力，以便迅速、平稳地恢复从事新投资项目的工作。因此，以下政策尤其有害：设定最低工资；公司内部劳资关系的僵化和工会化；阻挠，特别是法律禁止解雇；以及（以临时劳动力调整计划，失业救济金和有保证的最低收入计划的形式）创建补贴和补助金。如果显而易见的是，对于许多人而言，更有利的选择是依靠补贴生活、参与地下经济并避免正式工作，那么这些政策的结合会阻止人们找工作和想要找工作。^②所有这些措施和结构改革都必须伴随着对福利国家的必要改革。我们必须允许那些渴望通过相应的税收减免将其福利外包给私营部门的人，将养老金、医疗保健和教育的责任归还给公民社会。（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指出的那样，每年，数以百万计的西班牙公务员中有近 80% 自由选择私人卫生保健而非公共卫生保健。这一定是有原因的……）

因此，应对疫情，特别是从疫情中恢复的最合适的经济政策方法或路线图是很清楚的。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众所周知的，而另一些则是“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对于所有通过在人

más letal,” *Procesos de Mercado* 17, no. 1 (Spring 2020): 439-441.

^① Jesús Huerta de Soto, “The Theory of Dynamic Efficiency,” in *The Theory of Dynamic Efficien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30.

^② 另见 Jesús Huerta de Soto, *Money, 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s*, op. cit., pp. 453-455 中的相关评论。

群（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在疫情期间有多恐惧和迷失）中建立虚假和无法实现的期望而陷入助长民粹主义煽动的陷阱的人。^①

（二）疫情之前几年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消耗

现在，让我们集中讨论当前的 Covid-19 疫情，我们已经对其进行分析并将其用作本文的主要范例。我们可能会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它对疫情的未来经济发展有着超出必要范围的负面影响。实际上，这场从 2020 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的疫情，其背景是全世界的各个中央银行已经发起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见——由于其强度、广泛的性质以及所涉及的国际协调——的货币注入。这种极度宽松的政策在疫情爆发之前已经被采用了好几个月甚至几年，而中央银行采用它的幌子，首先是协助在 2008 年大萧条之后出现的复苏，然后是应对假定的或实际的总是会不时出现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英国脱欧等）。

在我关于“欧盟的日本化”的文章中，^②我解释说，在疫情爆发之前，中央银行实施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一方面，他们显然未能将价格提高近 2%。实际上，在巨大的制度僵化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下，随之而来的经济主体对货币需求的广泛增长已经基本抵消了货币的大量注入，因为持有现金余额的机会成本已降至零。此外，在持续的监管和经济干预主义的环境下，可持续投资的明确机会并未打开，这压低了对利润的期望，并阻止了从 2008 年大萧条开始失去的信心的完全恢复。结果，对 2008 年之前几年的泡沫和信贷扩张期间所犯下的所有投资错误的必要纠正也就不可能完成。另一方面，当中央银行启动大规模货币注入、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时，它们实际上消除了（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不同政府不得不采取或贯彻的即将发生的经济、监管和体制改革的任何激励，这些改革对建立一个信任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企业家可以摆脱不必要的限制和障碍，可以将自己的创造性付诸实践，并进行能提供可持续工作的长期投资——至关重要。的确，如果事实上无论产生多少赤字，中央银行都将直接或间接地以零成本为其提供资金——也就是说，通过将其完全货币化——那么什么样的政府会去承担，比方说，将其账目置于一个稳固的基础上和开放劳动力市场的高昂的政治成本？例如，欧洲中央银行已经拥有欧元区成员国发行的主权债务的近三分之一，而在它实施无差别地购买该债务的政策的那一刻，它就终止了成员国迫切需要的经济 and 制度改革的整个过程。从经济理论中得出的结论再简单不过了：在高度制度僵化和经济干预主义的背景下，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无限期地让受影响的经济体保持僵化和死气沉沉，并使各个公共部门的债务增加到很难维持的程度。

（三）中央银行对突发性疫情的反应

正是在这些令人担忧的经济环境（中央银行实际上已经用尽了他们整个非常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工具库）中，Covid-19 疫情在 2020 年 1 月意外爆发。各货币当局的反应简直一模一样：它们进一步加大了货币注入。为此，它们扩大了其金融资产购买计划（价格不断上涨，这让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大型投资者高兴，而以此方式，在大多数公民的经济萎缩并进入衰退之际，中央银行使少数人的财富变得更多了）。此外，事实上，新的货币正越来越多地通过直接补助金和补贴金——通过货币化公共赤字筹集资金——进行分配，因

^① 例如，参见 Philipp Bagus, José Antonio Peña Ramos, and Antonio Sánchez Bayón, "Covid-19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Hyster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 no. 4 (2021): 1376.

^② Jesús Huerta de Soto, "The Japaniz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Mises Wire*, Mises Institute, Dec. 11, 2019, op. cit. 如 Jesús Huerta de Soto, *Money, 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s*, op. cit., pp. 647-675 所示，“中央计划的不可能性定理”同样完全适用于中央银行。

此，大部分新创造的货币已经开始直接流入家庭的口袋。但是，至少从 1752 年休谟（Hume）^①指出以来，我们就已经知道，货币单位在公民之间的平均分配并没有真正的效果。^②因此，货币当局最终甚至不希望听到关于弗里德曼（Friedman）著名的“直升机撒钱”作为其货币政策的工具，因为只有在仅少数部门、公司和经济主体首先收到新的货币，伴随着有利于一小部分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所有附带影响时，后者才会产生明显的扩张效应。（我提到这个群体与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是金融市场中行动者重要的决定因素有关。）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或早或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受到私人银行^③和无动力的企业家部门的冲销），新的货币最终将到达消费者的腰包，并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因为出现了不可避免的货币单位购买力损失的休谟效应。而且，随着家庭最初的不确定性逐渐被克服，其成员不再感到需要维持如此高的现金余额，或者他们只是不得不以补贴的形式花掉所收到的钱，以在他们失业和无法生产时维持生活，这种影响将变得越来越明显。无论如何，一切都指向同一方向：对由于疫情而减少的产量的不断增长的货币需求，不可避免地导致价格上涨的压力越来越大。^④而这正是我写这几行的时候（2021 年 1 月）开始出现的情况。例如，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并达到三年来的最高点。运费和许多其他原材料（矿物、石油、天然气等）的价格也飙升，甚至创下历史新高……

（四）中央银行已经走入了一条死胡同

结论再明显不过了。中央银行确实已经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如果他们逃避现实，甚至进一步推进货币扩张和不断增加的公共赤字货币化政策，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公共债务和通货膨胀危机。但是，如果担心从疫情之前的“日本化”场景过渡到疫情之后的近乎“委内瑞拉化”场景，它们停止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公债市场的高估就会立即变得清晰，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将随之而来，并且从中长期来看将是痛苦的。实际上，正如“中央计划的不可能性定理”所表明的那样，中央银行（真正的金融中央计划机构）不可能始终正确地确定最合适的货币政策。

我们显然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关注来自投资者、“专家”、权威人士、甚至是最著名的经济和货币当局越来越焦虑和不安（我甚至会说“歇斯底里”）的反应和建议，是很有启发性的。

例如，不断出现的新文章和评论（特别是在鲑鱼色的报纸上，从《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开始）总是会让市场放心，并发出这样的信息，即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将在未来很多年保持不变，因为中央银行不会偏离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投资者可以放轻松并继续通过在债券市场上交易而致富。反过来，央行行长则谨慎地宣布修改其通胀目标，以补偿那些无法实现目标的年份为借口，使其更加灵活（显然是朝上的），并证明即使通货膨胀

^① David Hume, “Of Money,”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 E.F. Miller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5), pp. 281 及之后。休谟明确指出，如果因为某种奇迹，每个英国人每天早上醒来发现他的口袋里又多了五英镑，唯一的实际影响就是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即名义价格的上升），因为英国的生产能力将保持不变（第 299 页）。凭借他著名的“直升机撒钱”，弗里德曼简单地复制了休谟的这个例子并对其进行了现代化处理（没有引用）。

^② 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本人最终别无选择，只能承认以下几点：“通俗的叙述告诉我们，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的结合已经成功抵御了疫情，但是在这一点上，我还不清楚中央银行采取积极行动的好处。我已经和我的妻子争论了好几天，我们是否该在我们最喜欢的餐厅吃晚餐了：争论的重点不会改变，因为利率持续下降。” *El País*, Madrid, Sunday, January 17, 2021, p. 38.

^③ 货币当局与私人银行之间的关系是“精神分裂的”：金融当局向私人银行注入大量流动性以提供贷款，但不断威胁要增加其资本要求并非常密切地监视其借款人的选择。

^④ 在众多文献中，参见 Michael D. Bordo and Mickey D. Levy, “The Short March Back to Inflati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4, 2021, p. A17.

飙升也没有采取货币控制措施是正当的。^①货币当局的其他顾问甚至提议放弃通货膨胀目标，直接设定遵守特定利率（尤其是低利率）曲线的目标（也就是说，所有公开市场操作都需要实施的利率曲线将多年为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所有这些都受到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尽管叫这个名字，但它既不是现代理论也不是货币理论，仅仅是古老的凯恩斯主义和重商主义菜谱的杂烩，相比真正的经济理论家，它更具有几个世纪以来乌托邦梦想家（因为他们认为赤字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可以通过发行债务和货币化而无限限制地为赤字融资）的特征——的代表称赞；这一理论在我们的经济和货币当局中造成了严重破坏。^②现在我们来谈谈最后一个“聪明的主意”，这个主意正变得越来越流行：撤销中央银行购买的公共债务（如我们所见，已经达到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首先，加入支持这种撤销的声音的越来越多的人显然放弃自己了，因为，如果中央银行肯定会始终以零利率回购为满足到期债务而发行的债务，则无需撤销。人们现在恰恰在要求这样做的事实表明，他们对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迹象感到焦虑，并伴随着对固定收益市场崩溃和利率回升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至关重要，通过撤销来减轻对浪费的政府的压力，这等于减少了这些政府发行的债务总额的近三分之一。人们认为，这样的撤销只会对抽象的机构有害，它将像中央银行一样远离大多数公众。但是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如果执行了像现在所请求的那样的撤销，则以下内容将变得显而易见：首先，中央银行将自己局限于创造货币并通过金融市场将其注入系统，因此使少数人变得非常富有，却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的、真实的、长期的影响（除了人为地降低利率和同时破坏生产资源的有效分配外）。^③其次，如果这种撤销发生，中央银行不仅将失去所有信誉，而且还将失去未来实行其公开市场购买政策（量化宽松）的可能性，反对这项政策的公众强烈抗议将非常巨大。^④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将不得不将自己限制于直接向公民注入货币（弗里德曼的“直升机撒钱”）。从它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角度来看，这将是唯一的“公平”注入，但是由于它们缺乏短期内可观察到的任何实际的扩张性影响，因此，这将意味着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来显著影响未来经济的能力的终结。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给投资者的唯一明智的建议是，他们应该尽快卖出所有固定收益头寸，因为我们不知道央行会继续人为地维持这些证券的价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多长时间。实际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对冲基金等其他最机敏的投资者已经通过使用衍生工具和其他先进技术来押注固定收益市场的崩溃，同时，在公开场合，他们继续通过最负盛

^① 这项政策的通过将对欧元的治理造成巨大压力，以至于很可能导致欧元的消失。

^② 例如，参见 Patrick Newman, “Modern Monetary Theory: An Austrian Interpretation of Recrudescing Keynesianism,”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no. 48 (2020), pp. 23-31 以及 Mark Skousen 和 Gordon L. Brady 发表在同一期期刊上的批评文章。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本人最受现代货币理论的吸引：例如，参见 “Las claves del plan Draghi” [The Key Points of the Draghi Plan] to save Italy, *ABC*, February 4, 2021, p. 30.

^③ 真正的悲剧是，专家、政治家和公民忘记了利率（或现在财货相对于未来财货的价格）是所有价格中最重要（因此，在所有价格中，最重要的是由自由市场来设定这一价格），在不妨碍经济计算和生产资源的正确跨期分配的前提下，政府和中央银行将无法不受惩罚地对其进行操纵。

^④ 除其他原因外，因为没有资产要出售（由于撤销），如果通货膨胀率上升使其在将来成为必要，中央银行将无法从系统中消耗储备金。只有在向 100% 准备金的银行系统进行不可撤销的过渡的情况下，就像我在《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同上，第 791 页及之后）第 9 章中所建议的那样，撤销中央银行手中的公共债务，以防止其就像我建议的那样，在债务被交换成现在可以抵消活期存款的银行资产时，成为实体经济的重要部分的所有者，当债务被交换为银行资产（现在可以抵消活期存款）时，这样做才是有道理的。

名的评论员向媒体泄露令人放心的消息和建议。^①这应该不足为奇，因为他们希望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以尽可能高的价格摆脱债务市场。

（五）公共支出的“主菜”

现在，我们来谈谈为克服由疫情引起的危机并恢复正常而呈上的最后一道菜：忘记了将公共账目置于一个稳固的基础上，或削减对其的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忘记了降低企业家的税收压力或减轻官僚主义和监管负担，使他们恢复信心并开始新的投资。忘记了所有这些；所提倡的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依靠财政政策，并进一步（不成比例地）增加公共支出，尽管我们被告知，应该优先考虑对环境、数字化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这种新的财政政策死亡阵痛是顺周期性的，并且会适得其反。例如，到今年夏天（2021年），当欧盟以无偿方式向西班牙提供的1400亿欧元“甘露”（由欧盟当局组织的7500亿美元的总计划，可扩展至1.85万亿美元的贷款）开始出现时，西班牙和其他欧盟国家的经济很可能已经在自行复苏。因此，这些资金将吸收和转移稀缺资源，而这些资源对私营部门启动和完成必要的投资项目（因为它们是真正有利可图的，所以在没有公共援助的情况下，它们靠自己就能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创造大量的可持续就业）的能力至关重要。这些工作与那些总是不稳定的工作截然不同，后者取决于导致消费性公共支出——即使是对冠冕堂皇的关于环境项目和数字“转型”项目的支出也是如此——的政治决策。而且，我们甚至无需提及在管理收到的资源上公共部门固有的效率低下问题，以及其分配（这对于那些寻求利益和维护政治腐败制度的人来说总是易受攻击的）的不可避免的政治化。例如，我们大家都记得“计划E”的惨败，它涉及公共支出的注入，并由萨帕特罗的中央计划政府推动以应对2008年的大萧条。我们还记得日本的财政政策的不幸失败，即公共支出大幅度增加，但这除了使日本成为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外，并没有其他明显的效果。简而言之，历史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结论

并没有奇迹般的捷径来克服当前疫情所造成的严重危机。即使政府和货币当局疯狂地做出在表面上有益的事情，努力在公民面前表现成不可或缺的“救世主”。即使所有这些当局都系统性地隐藏了其固有的无能（如奥地利学派所表明的那样），即无法达到目标并获取它们所需的信息以将协调的特性注入其命令。即使它们的行动是系统性地不负责任和适得其反的，因为它们浪费了社会的稀缺资源，妨碍了在投资过程中正确分配资源和进行理性的经济计算。尽管如此，也就是说，尽管有政府和中央银行，但从现在起的几年后 Covid-19 疫情将只是一个可悲的历史记忆，它很快就会被后代遗忘，就像没有人记得一个世纪前的“西班牙流感”及其给经济和人们健康造成的更大的代价一样。现在，像那时一样，我们将渡过难关，这得益于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努力——努力在小范围（无论如何，它们仍然对自由企业和不受控制的市场保持开放）内创造性地开展我们的谋生计划。

2021年1月27日于马德里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

^① 例如，参见《金融时报》声望很高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或保罗·克鲁格曼本人在《国家报》的金融增刊中对货币和财政政策发表的评论和建议。他们不推荐进一步货币注入和公共支出的时间几乎不到一周。